

在梦想与现实间徘徊,越来越多大学毕业生走向二三线城市

他们为什么选择离开北京

离京不是逃离,只是自由的选择

2007年元旦刚过,李峰开始了在私企的新工作。在这里,他干了5年。

李峰利用自己的特长,帮助这个尚处于起步阶段的公司建立起较为规范的管理制度。丰厚的年终奖让李峰对自己的生活比较满意,但另一方面,他经历了许多人事关系的磨合,他笑着形容是“勾心斗角”。

私企的工作没有想象中的轻松,建立管理制度,规范公司运作的第一年,李峰“几乎每天都要熬夜”。李峰回忆那个时候,“目的只为了挣钱,再没有刚毕业时的单纯了。”

当走出校门之后,发现生活不再处于“摩擦力为0”的状态时,有的人则寻觅另一种生活。

2009年,来自湖北的张静刚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毕业,进入一家行业杂志从事文字工作。“刚毕业的时候,我熟悉的几个女同学都留在北京,我也就随大流,海量投递简历后,在北京找了份工作。”张静回忆周末,“还和同学合租,晚上回来聊天说笑,周末出去逛街吃饭,感觉和在大学里差别不大,活得很自在。”

但这种状态持续了一年以后,张静心里产生一种无形的压力。“工作第二年,漂泊感就变得很强烈。”张静说,那时会开始考虑结婚、买房、生子等一系列的问题。

张静的父母也强烈要求女儿回家。“家里人也觉得自己的工作不稳定,又怕我在北京变成大龄剩女。”父母希望张静回家找个轻松工作,早点把生活也安顿下来。“在北京的亲戚跟我说,你要在这种城市活得比较滋润,每个月的工资就要买得起1平方米房子。”张静当时还是个月光族。

张静两年后,张静还是单身。“感觉人的流动性很大,参加工作之后,人与人之间接触不深刻,也缺少信任。关于对方的家庭环境、成长经历,我都没法深入了解。想找到合适的对象,很难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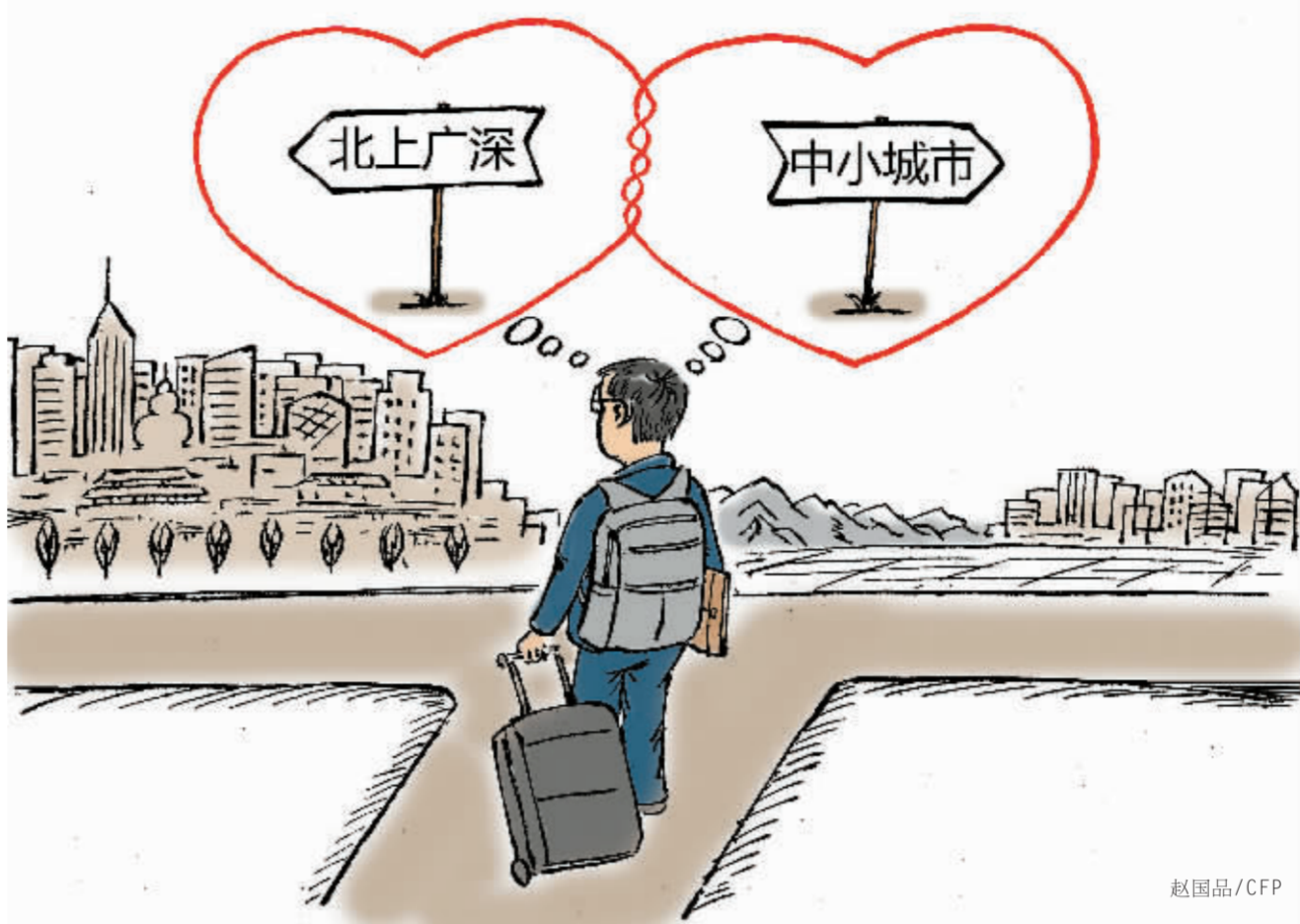
在北京工作两年半以后,张静通过公务员考试回到家乡,成为当地检察院综合部门的工作人员。“白天也很忙碌,只是生活会更有规律。”张静这样形容现在的生活。

从事法律工作之前,张静没有发现自己对司法“特有兴趣”。目前,她正在准备司法考试,想转到司法一线工作。“再让我去做别的事,我就没那么感兴趣了。”电话里,张静笑着告诉记者。

“从北京回来安顿好的时候,忽然就有了强烈的归属感。”虽然不知道怎么形容那种强烈,但张静认为是“因为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”。

回家一年后,张静就成家了,她说,“对象是看着他长大的一位阿姨给介绍的,我觉得这比较可靠,不像在北京,媒人觉得两人年龄相差无几,就随便过来牵线。”

“不想离开北京的朋友,心里还想着干点别的事,还存有奋斗的激情。”张静离开了



赵国品/CFP

北京,但还有不少人不想回家。

从事人力资源研究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海波表示,个人发展的高度肯定受环境的制约,不过,中国未来发展的潜力反而在二三线城市,二三线城市在城镇化中的潜力非常强大,很多城市可能会模仿北京上海一线城市的发展思路,所以,当他们回到当地,应该是超前者的角色。

“发展要从动态来看。从一线回到二线,也许对有的人来说是一个缓冲,他会在当地的城市更有成就感,更有信心创造生活,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某些想法。”于海波说。

张其光则表示,学校尊重学生的个人选择,也鼓励大家根据自己的原因和特点作出合适的选择。“学生作出多样选择也是经济发展的体现。这说明地区差异在变小,各地发展机会也更加均衡。择业选择的多样化和均衡化,反映了时代的发展”。

正在发生的生活变故

生活的意外,同样左右着毕业生的选择。

“2009年,是我到北京的第8年,也没想过那之后会离开北京。”来自新疆的明新现在定居成都。去年,明新刚大病一场,正犯腿病,现在他还无法适应四川潮湿的气候。

“2010年,我把妻子接到北京,希望她能习惯北京。但两年之后,我发现她一直没有很好地融入。”明新说,“何况那个时候,北京的房价已经不是10年前的行情了。”明新觉得自己最失策的事就是刚到北京时,没考虑攒钱买房。

陆杰华教授也回忆:“十多年前,尽管北京的房价也不便宜,但很多人通过自己的奋斗都买得起。现在,我觉得在北京安居乐业是太难。”

“不是说无恒产无恒心吗?成都这边房价较低,结婚后也要考虑到妻子的感受。”明新坦言,“离开是很纠结的。十多年前,离开新疆到北京,是一次连根拔起;到北京从头开始,认识新的朋友,适应新的生活,又过去一个十年。”

明新一直认为北京太大,找不到融入感,觉得“自己不属于这个地方”,但他也坦承,“最后真要把你拔起来的时候,你发现根须已经扎在这片土地上了”。

张静就开始了“偷偷”准备公务员考试,张静一直等到考试的部门说可以去上班了,才办理北京单位的离职手续,“连同事都觉得好突然”。

张静告诉记者,自己想了很久,都没有找到留在北京的理由。“当时有认识的广告专业同学规划很明确,她说自己会奋斗到35岁,再离开北京,回家乡办个小公司,物质基础和技术经验都有了,地方城市的产业需求过几年也起来了。”张静说,“对比一下别人,自己有点慌张”。

张静形容自己离开北京的时候,又轻松又感叹。“快走的时候,也和当初留在北京一样,雄心满杯的,因为又要接受一种新生活,没有很多心理负担”。

但离开的那天,张静却和朋友发了很长的短信,讲了一路关于“主客颠倒”的感触。“以前放假回家,觉得还要马上回京的,回家反而变成了一种偶然,但那次离开,就觉得要和它斩断了似的,觉得一切都没什么关系了。”张静说,“但你最美好的时光却

明新准备辞职回老家。可是,没多久,“父亲就在睡梦中走了”。

“现在想想,如果他们那么需要我在身边,我是不是应该早点回去或把他们接到身边来?”明新感到遗憾,“但来北京也是心之所向。”明新总结自己在北京的经历,“把这些经历叠在一起,就像过了几生几世”。

带着“几生几世”的回忆,2012年,明新离开北京,带着妻子回到她的家乡成都,“安稳下来”。

2012年,对李峰来说,也一样刻骨铭心。那一年,李峰离开公司,想自谋出路。和朋友合伙做项目投资,将几乎所有的积蓄都投进去了,却遭遇了一场骗局。

被骗以后,李峰把自己关在家里,20天没出门。

后来,李峰无意中了解到花卉市场收益可观,又实在想找个清静之地,于是,他租下4间花棚,开始养花,“也开始想想毕业十年来,当初的规划与如今的结果”。

开始养花的半年,由于没有掌握种花的关键技巧,连续两季都失败了。后来,在同学的帮助下,又过了一季,花终于开好了,他“又多了门手艺”。

今年元月,李峰租下家附近大型商超一楼的门面,尝试卖花。店面面积不大,以

多肉植物的售卖为主。记者采访的两个多小时,与李峰的谈话大概每十分钟就会被顾客的回价打断。

二三线城市开始思考如何留住人才

在张其光看来,清华大学留京毕业生人数整体减少,连续3年京外就业率突破50%并非易事,学校进行了很多职业辅导。“对学生的教育和引导不可能是很孤立的维度,这是一件综合的事情。”张其光说,交流活动很多都是到北京之外的地方,也有很多外地同学参加,“能让我们的学生更了解北京之外的城市。”

于海波表示,大学生就业的过程是个人发展和城市发展不断相互寻找的过程,从单位来说,也要不断调整自己管理模式,并要适应新时代大学生,找到适合自己的人才;从城市的发展来说,“发展规划、水平和阶段也是吸引、接纳或排斥某些人才的过程”。

安徽一家药业有限公司今年第一次来北京招人。在中国人民大学专场招聘会上,他们的展位很热闹。该公司负责招聘的工作人员史宁介绍,很多应聘者看中的,是他们开出的分红和股份。

“我们给出的条件,是开分公司可以成为合伙人,可以参与分红,做到总监及以上,是可以拿到股份的。”史宁说,招聘当天,他们收到了30多份简历,而他们一共准备招5个人。

从青岛前来招聘的周洪则打起环境牌:“工资水平上,北京和青岛也就差1000多元,但是压力会差很多,青岛的工资水平正在逐年提升。青岛的空气质量比北京要好得多”。

二三线城市的吸引力,也正实实在在地显示出来。近几年,内蒙古大学从北京招的人越来越多。

内蒙古大学人事处工作人员丛晖说,二三线城市给予人才的优厚待遇和晋升空间,越来越被一些人看到。“大城市人才济济,在北京可能就是是一名普通的教师,但是来到我们这里,就可能可以迅速成长为一名学科带头人,他的成绩也更容易被人看到,还有一些人抱着‘宁做鸡头不做凤尾’的想法来的。”

毕业生孙林也是这种就业模式下的受益者。一年前,他硕士研究生毕业,没有选择在北京打拼,而是去了西藏阿里工作。“在北京不就是因为机会多吗?去其他地方不代表就没有机会啊,说不定会发展得更好,那到时候再回北京,岂不更好?”孙林将之称“迂回策略”。

一年过去了,孙林的工作表现和成绩,得到了当地领导的肯定,由于工作需要,2015年,中共阿里地委组织部决定,增加来京引进人才的指标,还打出了“紧缺专业人”的招聘启事。

“阿里地区人才层次比较低,结构不平衡,到我们那里工作的,大部分是本科生和大专生,研究生很少,北京这边人才层次比较高,我们想通过来北京招聘,改善我们的人才结构,招一些紧缺的专业人才过去,支援我们的发展。”中共阿里地委组织部负责招聘的旦增说,“我们现在是一边引进人才,一边尽快完善我们的人才制度,下一步思考怎么留住人才。”

(文中毕业生姓名均为化名)

本报北京4月1日电

离京“北漂”忆北京——

在这个城市既欢乐又忧愁

实习生 谢亚乔 马慧娟
本报记者 卢义杰

已经回到湖北老家当公务员的张静,不管对那段北漂经历还是对如今的老家生活,都持“拥抱”的姿态。

“当时就想出去走走,填志愿的时候,拿着招生目录随便翻了翻,就定了北京的高校。”张静回忆还是学生时候的自己,“对北京很好奇,觉得美好的生活就要展开”。

因为这份雄心壮志,2009年毕业的张静“没想过回去”,找了份工作,还和大学的4个朋友住在一起。“5个人,两室一厅的房子,2800元一个月。”张静说,“把客厅改成房间就挤得下啦。”

“因为都是同学,我觉得住在一起热闹。”房子虽小,留在记忆里的却不是拥挤。每到周末,“在北京其他地方工作的同学都会到我们那儿看电视,每次客厅都坐满了人。因为大家都是同学,说话不用像在群租房里那么拘束。”

同样在北京,同样刚毕业,刘军最开始在北漂生活却“辛苦”很多。

来自山西阳泉的刘军2007年从北京一所专科学校毕业,专业是当时很热门的数控技术。“如果不是为了等女朋友,我或许就离开北京了。”当年的女友,也是现在的妻子,比刘军低一届。

刘军在学校附近开了一家杂货店,还

请了一个阿姨帮忙照看。在开店的同时,他还在家做电脑上班,“当时考虑自己以后可能要做网购,所以就先在家做电脑公司工作,顺便学点电脑技术。开杂货店只是赚点生活费”。

“那时候,白天到公司正常上班,晚上回家杂货店接着上班,双体的时候也在店里,吃饭都是叫外卖,随便对付。”刘军告诉记者,“是辛苦,压力也有。因为开杂货店的3万元本钱是父母给的,我总不能把钱打水漂。而且已经毕业了,怎么可能还找家里伸手要钱呢?要自己赚钱了!”

一年后,女友毕业了,杂货店也没有亏本,“关掉店面,还剩下4万元”。

带着这点本钱,又找亲戚借了点钱,毕业一年的刘军和女友又开始做电视购物,后来又顺势转入互联网电子商务。“2009年的下半年开始正式做电商,主要销售家居用品。”刘军介绍。

进入电商的第一个月给刘军印象深刻,“那个月,我基本上有20多天都是在火车上过的。跑市场、看样品、谈合作、了解情况,因为刚开始做,又怕被骗,所以都是自己亲自跑去看,才觉得靠谱”。

毕业后第三年,刘军不仅没有像父母说的那样“给你三万元,玩完了回来找个安定工作”,还带着妻子开始进军电子商务,“抱着做生意的心态,留在北京打拼”。

刘军评价自己是很理性的人,“到了一个年龄,就做适合那个年龄的事。该干什么

就去干,有些东西,我会很早就考虑”。

同样,北漂两年后的张静,虽然觉得“青春还有挥霍的余地”,但却开始思考工作的意义。

“你会担心如果这份工作一直做下去,是不是有意义。每个人留在北京都有自己的考虑,那我留在这个地方,有什么考虑?”张静反思,“我做的是文字工作,这个职业并不是离开北京就没有生存的土壤”。

张静告诉记者,自己想了很久,都没有找到留在北京的理由。“当时有认识的广告专业同学规划很明确,她说自己会奋斗到35岁,再离开北京,回家乡办个小公司,物质基础和技术经验都有了,地方城市的产业需求过几年也起来了。”张静说,“对比一下别人,自己有点慌张”。

张静就一直等到考试的部门说可以去上班了,才办理北京单位的离职手续,“连同事都觉得好突然”。

张静形容自己离开北京的时候,又轻松又感叹。“快走的时候,也和当初留在北京一样,雄心满杯的,因为又要接受一种新生活,没有很多心理负担”。

但离开的那天,张静却和朋友发了很长的短信,讲了一路关于“主客颠倒”的感触。“以前放假回家,觉得还要马上回京的,回家反而变成了一种偶然,但那次离开,就觉得要和它斩断了似的,觉得一切都没什么关系了。”张静说,“但你最美好的时光却

留在了这个城市。这里有朝夕相处7年的朋友,他们曾是生活的重心”。

王云2008年从北京一所高校毕业,一直在外面游历似地体验生活,在北京和天津工作一年,又在成都工作三年,最后回到家乡青海,成为西宁市的公务员。

王云毕业时的想法就是“不回家,但也不准备在北京待太久”,而想“去外面多转转,了解不同的风土人情”。

现在,张静和王云都在家乡当公务员,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,双体的时候终于不用为“去哪个人少的地方,坐哪一趟人少的车出行”而烦恼,也不再会出现“一年只能看到父母一两次的”状况。

张静告诉记者:“在这样的体制下,工作必须要一步一步走,每次上升都有一定的时间,但不可能是坐火箭。公务员的工作是慢慢成长的过程,需要不断积累经验。”张静对这个过程的评价是,“很累,但会有一种安定感,小城市有它自己的便利

和生活态度。”

张静喜欢观察周边人的生活,她说能感觉到这些人“心里的快乐”,给自己也带来积极的心灵感应。“也不后悔曾经的北漂生活,那是在当时的环境下,自己最愿意的选择。只有经历过不同的生活,并有过从学校到社会的过渡,看事情的眼光才有了差别”。

“很庆幸自己有过的北漂的经历,眼界开阔的人更懂得开开心心、享受生活。”张静回忆,“刚上大学,从地方小城到北京,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,整天雄心勃勃的,也相信自己注定会有番与众不同的、轰轰烈烈的事业”。

张静说,在北京的6年,是一个从“这是我的城市”到“这完全不是我的城市”的过程。

刘军对此有同样的感受,“在学校的时候,对学生的身份面对社会,离校以后,以社会成员的身份又该怎么面对社会?这期间发生的很多事情,都在锻炼你”。

直到2010年,刘军还在在北京坚持做电商,但生活成本在加大。“那年10月,我考虑把仓库搬到妻子的老家浙江金华,浙江也是电商的天下,大环境更好。”两个月以后,这个想法就被“想干啥就抓紧干啥”的刘军实现了。

“在北京也有很多朋友,但更适合喝酒吃饭。”刘军说,“而在浙江,认识的很多朋友是实实在在做生意的,有在开店的,有开工厂的,交流起来,资源更多。”刘军给两个城市的的评价是:“北京,给别人打工的人才多;但在浙江,自己做老板的多”。

刘军正在想把公司再迁到杭州,“因为杭州的电子商务环境更好,市场氛围更好”。

他说,如果以后跟孩子说北京印象,那就是“在这个城市既欢乐又忧愁”。

本报北京4月1日电

(上接1版)要坚持公立医院公益性的基本定位,将公平可及、群众受益作为改革出发点和立足点,落实政府办医责任,统筹推进医疗、医保、医药改革,坚持分类指导,坚持探索创新,破除公立医院逐利机制,建立维护公益性、调动积极性、保障可持续发展的运行新机制,构建布局合理、分工协作的医疗服务体系和分级诊疗就医格局。城市公立医院改革综合性强,涉及面广,在改革公立医院管理体制,建立公立医院运行新机制,强化医保支付和监管作用、建立符合医疗行业特点的人事薪酬制度、构建各类医疗机

构协同发展的服务体系、推动建立分级诊疗制度、加快推进医疗卫生信息化建设等方面都要大胆探索、积极创新。要落实政府的领导责任、保障责任、管理责任、监督责任。要立足我国国情,加快推进改革试点,尽快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。

会议指出,人民陪审员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。要通过改革人民陪审员制度,推进司法民主,促进司法公正,提升人民陪审员制度公信力和司法公信力。要坚持党的领导、人民当家作主、依法治国有机统一,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

会主义法治道路,围绕改革人民陪审员参审条件和选任程序,扩大人民陪审员参审范围,完善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机制,探索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职权改革,完善人民陪审员退出和惩戒机制,完善人民陪审员履职保障制度等重要环节开展试点,提高人民陪审员广泛性和代表性,发挥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作用。

会议强调,改革人民法院案件受理制度,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,目的是要通过改进工作机制,加强责任追究,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“立案难”问题,保

障当事人诉权。人民法院要明确登记立案范围,规范登记立案程序,健全配套机制,制裁违法滥诉,强化立案监督,逐步建立一套符合中国国情、符合司法规律的立案登记制度,坚决杜绝“有案不立、有诉不理、拖延立案、增设门槛”等现象。要强化法治意识,积极配合做好工作,坚决杜绝干预、阻挠人民法院依法立案受理发生。要加强诉讼诚信建设,加大对虚假诉讼、恶意诉讼、无理缠诉行为的惩治力度,依法维护正常立案秩序。

会议指出,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重要

举措实施规划(2015-2020年),是今后一个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总施工图和总台账。要组织好规划实施,注重政策统筹、方案统筹、力量统筹、进度统筹,确保改革各项任务相互协调,改革进程前后衔接,改革成果彼此配套,及时解决实施中的矛盾问题,努力把各项重要举措落到实处。

会议强调,推进全面深化改革、全面依法治国,任务很重,时间很紧,要发扬钉钉子精神,乘势而上、顺势而为,加大改革方案出台力度,试点工作要抓紧抓实,出台的方案一定要具有可操作性,细化改革任务的

责任主体,完成时限,考核问责等。改革方案通过后,能公开的要向社会原原本本发布,以利社会共同监督落实。要抓好改革方案的进度统筹、质量统筹、落地统筹,理清各项改革的“联络图”和“关系网”,增强改革的有序性。

会议还就深化农村改革、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等问题进行了研究。

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成员出席,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。